

论周立波的前期思想和小说创作

吴肇荣

周立波是一位得到人们较多研究和评论的作家,但研究界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作家后期的文学活动和创作业绩上,而对他前期的思想和小说创作关注不够,评论甚少。为数不多的几篇全面论述作家创作道路的文章,涉及了他的前期思想和创作,但这也只是为了阐明他后期的创作发展和成就提供一个起跑点和比较面,评述简略,没有把它作为作家整个文学生涯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时期和阶段加以研究,揭示其思想艺术特色,以及它对作家以后创作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周立波研究工作中需要及时补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从这个方面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

周立波是一九二八年来上海求学,寻找革命的真理和道路时开始写作活动的。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申报》上发表处女作散文《买菜》,到一九七八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最后一篇小说《湘江一夜》,他的创作活动整整经历了五十年的光景。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一九四二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在这一年,周立波参加了在现代文艺运动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随后又参加了文艺整风。在这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动中,他以党的文艺路线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针,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思想和创作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总结,认识到以前

“阅读了许多西洋古典的作品,不知不觉之间对这些东西有些迷惑”,而“漠视了比古典作品所反映的内容要雄伟得多的眼前的工农兵的斗争的现实”,因而自己虽然“也曾经到过延安的乡下,但没有和农民打成一片,对农民的语言、生活和劳动,不懂和不熟”,也就写不出深刻反映时代并真正为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来^①。通过这次回顾和总结,周立波领悟到一个深刻的道理:对于一个有志实践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来说,光从理论上接受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光有表现革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热情和愿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而熟悉和理解自己的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并同他们相结合,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才有可能更真实更深刻地描写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反映出生活的发展和时代面貌,使创作达到革命现实主义的境地。思想认识的提高,促使他努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创作的实践面貌,从此他自觉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在社会变革和生产建设的热潮里,汲取创作激情和素材,努力创作符合时代和人民要求的作品。作家与革命现实、与表现对象关系的这种根本性变化,给他带来了创作的新生面,写出了《暴风骤雨》这样杰出的作品,标志他坚实地走上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从而显示出他创作活动的前后期的区分。

周立波文学活动的前期,大致包括一九二八年他开始写作活动到四二年参加文艺整

风的十五年时间。其间的前十年，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先求学做工，进行业余写作；一九三四年加入“左联”，才专门从事革命的文学活动。“左联”时期的周立波，主要从事编辑、翻译工作，也“抽暇写作一些散文和论文”。撰写文艺评论，进行革命文艺理论的探讨和宣传，是他那时的主要写作内容；他前期的文艺思想和创作主张，就是在这个理论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九三七年九月，周立波离开工作战斗了十年的上海，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奔赴抗战前线，写了大量的散文、报告文学，后来收集在《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两个集子中。一九三九年底他来到延安，分配到“鲁艺”任教，讲授“名著选读”。一九四一年春，他到延安乡下工作，开始写作反映上海西牢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接着又创作以陕北边区农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牛》。应该说，作家前期文学活动的内容是丰富的。

纵观周立波在文学活动的前期所写的一系列文学评论、散文和小说，可以得知那时他初步树立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一个作家文艺思想的建立，当然与他个人的气质特点和文学爱好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解和对从事文学活动的目的性的认识。在“左联”时期，周立波和当时一些进步的文学青年一样，是在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走上文学道路的。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大地的一九二八年来上海投奔革命，表现出对人民革命的信仰和热情；一九三四年加入“左联”和党组织后，献身革命的思想就更加明确。正因为他从事文学活动是为了革命，文学活动就是他的革命活动，所以他在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上总是选择和追求于革命十分有益的东西。周立波深知，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其他事业一样，目的都是“尽那‘改造世界’的任务”，而要改造世界必先“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世界的矛盾和发展”，因而他就很看重主张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真实描

写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并对它作积极的探索。那时，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研究高尔基、鲁迅等革命作家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和创作经验，也广泛阅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福楼拜、果戈理等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作品，汲取他们正视人生、忠于现实的创作精神和精确描写生活的方法，从而逐渐形成了为人生、为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和创作主张。

周立波前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大致有这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文艺只是生活的反映，文艺应该真实描写生活。在与苏汶论争“作家的主观和社会的客观”问题时，他批驳了苏汶对作家的主观与社会的客观关系的颠倒，指出作家头脑中的生活映象，包括他的幻想“都是从现实出发永远不脱离现实的根据的东西”，因此“社会现实以及这个现实中的个人的地位等，才是‘艺术家的灵魄’的决定的基础。”^②基于对文艺与现实关系这种唯物主义的理解，他认为，文艺创作“不从抽象的观念出发，不从数字和概念出发，用艺术家的彩笔涂出生活的颜色，用艺术的手段表现生活和思想，使思想和生活在形象化的手段中活生生地再现出来，而社会的矛盾和发展也自然透露”^③，这才能造成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由于现实主义文学是从实际生活出发，以真实描写生活，揭示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为准则，因此它在艺术描写上就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品格。他认为，这一特征在旧现实主义文学中就已表现出来，“被尊为现实主义最高峰的巴尔扎克，就是以对于社会关系的实质的深刻的认识见长的。有味的是，巴尔扎克的理性的思索，竟能冲破感情的羁绊，使他的描写成为客观的科学的东西，成为经济学上的可贵的事例。”^④毫无疑问，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应该在更高的程度上达到这一要求。第二，周立波认为，革命作家应该继承旧现实主义正视人生、忠于现

实的“写真实”的传统和精神，但他们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下“写真实”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使他们认定人民大众变革现实、推动历史前进的活动为现实的根本内容，因此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应该着重表现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通过对社会矛盾和人民斗争活动的描写，展示生活的革命性变化。他曾高度评价过我国新文学运动中现实主义先驱们“为人生”的文艺思想，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的文学主张是“无限的严肃和崇高的”。但又说现实发展到当今（指三十年代初），生活又向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深一层的人类历史的课题”，就是要“描绘新的更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的真正的主角，工农大众”^⑤，使“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有新的时代内容。当抗日救亡斗争蓬勃开展之时，周立波又积极主张文学“要反映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切斗争情境，描写各种各样的民族英雄”，特别是作为抗日力量的“主体”的“劳动大众和他们的斗争生活”，以“鼓吹和推动已发和未发的民族革命的斗争。”^⑥第三，现实主义文学真实再现现实，反映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必须通过形象化的手段塑造艺术典型来实现。周立波指出：“典型的创造是一切文学的一个最大任务”，“是新的现实主义者的最大任务”^⑦，认为“我们的前面，正摆着一个富饶无比的现实。我们正可以塑造英雄的、前进的或没落的许多典型”。^⑧他在《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一文中，提出了关于典型创造的系统见解，指出典型人物“不是抽象的”，“不是现成的”，“不是偶然的”，“不是单纯的”，阐明典型既来自生活，具有个别具体的特征，但又不能是现成生活的照搬，而应该是通过个别偶然的生活现象，反映生活的某些必然性和复杂性的艺术实体。他经常用这种观点评论左联时期一些革命作家在典型创造上的成败得失，阐发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

周立波前期的现实主义思想，有两个重

要特点。一是特别强调反映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认为这才是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文学“写真实”的最根本的内容；一是十分重视作家世界观的作用，认为“为了洞察现实的现象，明辨历史的动向，我们应当熟悉世界和中国的现势，……并不断地学习人类智慧的最大的成就——革命的世界观”。^⑨这表明他是把握了革命现实主义（当时称新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的。但周立波的认识也有偏颇之处。他在强调着重反映革命人民斗争生活的同时，忽视了描写其他生活内容。其实对于非劳动人民的生活，只要作者能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加以认识和表现，反映出现实的矛盾及其发展，仍然可以达到革命的现实主义。在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上，他特别强调世界观的指导和决定作用，但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很少触及，把两者的关系看得比较简单。他虽然多次指出创作要达到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必须了解生活，熟悉对象，但这只是从一般观察和取得素材的角度说的，还没有进而认识到必须深入劳动群众，同他们相结合，做到以劳动人民的一员和代言人的身份去表现劳动人民。这种情况说明，周立波当时还只是在一些大的方面树立了革命现实主义思想，认识是初步的，不全面的，有待深化和发展。

二

对于一个创作家，光从他的理论言论来了解他的文艺思想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他的创作实际加以考察才能更好地把握它。周立波最早的创作活动是写散文、诗和报告文学，到一九四一年才开始创作小说。写于这一年的六个短篇（有几篇发表稍后），就是他前期小说的内容。其中，《第一夜》、《麻雀》、《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和《纪念》，写的是作家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西牢的斗争经历和感受，而《牛》则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延安农村的新生活。这六篇小说表现了这样一种创作倾向：一是写自己熟悉的、有亲身感受的东

西，做到了从实际生活出发；二是表现革命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有鲜明的革命倾向性。所以尽管这些作品今天看来，内容还不够厚实，对劳动人民的描写还有不够准确深入的地方，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他一开始就没有热衷于抒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而是明确地用自己手中的笔去表现革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正因为他追求的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艺术表现又力求精工有特色，所以他的第一批小说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报刊上发表，就立即受到普遍的好评，当时何其芳同志对《麻雀》就备加称赞。^⑩

《第一夜》、《麻雀》、《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纪念》是带连续性的一组短篇，它们较完整地反映了革命者一段狱中斗争生活。这些作品显示了作家前期创作的一个重要思想特色：创作视野一开始就冲破了“自我”的狭窄小天地，把眼光投向社会，揭露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歌颂共产党人救国为民的英勇斗争。作者注意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描写狭窄的狱中生活，通过革命志士入狱的经过和他们与外界的精神联系，把时代风云投影到狱中。《第一夜》中的“我”是因“煽动罢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和抗议日寇入侵而被捕入狱的。这正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爆发以后的第九天晚上，一个在民族灾难深重岁月中的除夕之夜。就在这个夜间，狱外传来了庆除夕的“爆竹的响声”，顿时使“我”“记起了今天晚上正是旧历的除夕，租界上悠闲的闲佬，正在用花炮和闸北日本人的大炮相酬和，来庆祝这个快乐的年节”。面对日寇加紧入侵，国民党反动派对外不抵抗，对内大搞法西斯统治，使民族频于危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严酷现实，“我”心情无比沉重激愤，决心与战友们一道，在监狱这一特殊环境里继续昨天的斗争。《麻雀》以下的几篇就通过一些典型性的事件和场面，从正面或侧面展现革命者与帝国主义强盗的尖锐矛盾和殊死斗争。在这里，作者

一方面以愤怒的笔墨揭露英国狱卒、包探和他们的上司，对“囚人”肆无忌惮的殴打、凌辱和折磨，反映出反动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卖国求荣，是帝国主义者能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又用激动的心情描写革命志士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行动和精神，他们不但在狱中坚持抗暴，而且还要力争“出去干革命，去赶跑英美帝国主义”，透露出民族、阶级解放的希望之光。小小的监狱激荡着时代的风雷和闪耀民族精神的火光，使这批小说具有一种激励人民去战斗的力量。

《麻雀》等五短篇在反映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时，始终把笔墨重心放在刻画革命者的性格、心灵和他们的成长上。注意通过残酷的斗争，从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上揭示人物的心灵美，赞美他们那种“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献出自己的一切是最愉快的事”的崇高情怀，开发革命人生的理想光彩和哲理意义，是这些作品另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五篇小说尽管都描写了具体的斗争情景和事件，但往往都是将描写向人物心灵深化，开拓人物的内心疆土，探索人生的真谛，形成小说带哲理味的独特主题。《麻雀》探索人们对真正自由的理解和追求；《阿金的病》揭示的是珍贵的同志爱；《夏天的晚上》围绕偶尔出现的乡愁家恋及其带来的思想冲突，写革命者应有的生活情趣；《纪念》通过小柳牺牲时镇定自若、视死如归的精神状态及对战友们的影响，透示了什么是革命者的人生价值和归宿。在这些作品中，《麻雀》是颇出色的一篇。它以一只小小的麻雀飞进牢房引起故事，麻雀作为自由的象征物牵动囚人的情怀，因而围绕着麻雀放与留的争论，实际上成了对自由意义的探讨和思索。经过一番争论，大家决定放麻雀，并让它带走一张富有深意的字条：“请爱惜你的每一分钟的自由。朋友。提篮桥监狱囚人启。”希望字条对拾者有教育、启发和鼓舞作用。这富有诗意的一笔，陡然打开了囚人们的瑰丽心灵。啊！原来他们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为了争取人民的自由甘

愿自己过不自由的监禁生活，而“自己不自由，倒在关心别人的自由”。象征贴切、意境完整、思想深邃，使这篇小说感动了不少读者。沙汀同志说：“通过一只麻雀，作者为我们展现了那些为革命遭受禁锢的人们的心灵：他们坚强，乐观，对于黑暗势力报以最轻蔑的嘲笑。这也可说是立波同志自己的写照。”^⑪其实，这五个短篇都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从心灵深处唱出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的赞美诗，对读者有很强的陶冶情性、净化心灵的作用。

短篇小说《牛》是周立波前期小说中的另一种类型的作品，它表现的是陕北边区农村的新生活，这是他描写农民的第一篇小说。一九四一年春，周立波同鲁艺毕业生葛洛、古元等一道去延安碾庄乡参加实际工作。回鲁艺后，他就以房东家母牛下崽子的生活故事作题材，创作了小说《牛》。从作品的思想意义上看，《牛》与《第一夜》等五个短篇有内在的联系，彼此都是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他们在革命潮流中的成长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但《牛》在题材内容上作了新的开拓，它描写了边区革命新政权下的农民生活，探索了革命给古老的陕北农村带来的变化。这篇小说以细腻、抒情的笔触，描写农民张启南在母牛下崽前后由懒变勤的过程，反映革命潮流对农村生活的巨大影响。张启南信迷信，“相信天上比地上快乐”，所以对生活缺乏积极的态度。他“实在有一点点懒”，不但对家务劳动懒懒散散，“就是在这农忙的时候，他也常常不做工”。无疑，这是一个还没有树立新的生活目标的老一代农民。但是抗日民主新生活的阳光已经照耀碾庄大地，影响农民的心灵，因而张启南“现在觉得地上也不十分坏，而且看他的样子，好象打算活到八十岁，再活四十年”。这种新的生活热望和乐趣，在他为母牛生产所作的精心准备和母牛下崽后所作的细心护理上，表现得很真切和强烈。小说以主人公日夜谛听母牛愉快的嚼草声和饱食后的美满叹息声结尾，烘托出抗日、民主、

革命新政权给农民带来了较好的光景和愉快的心境。从《牛》这一幅农村风俗画中，人们多少可以感受到“因为有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政权，人和人间，已经有了一种只有生活的圆满和快乐才能带来的亲切的温暖的東西”。当然《牛》对农村生活和农民精神的革命性变化描写还比较肤浅，对农民性格和心灵的刻画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后面作详细分析），但作家热情反映新现实和探索劳动人民新的精神风貌的创作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

周立波在开始创作小说之前，曾从事文学评论、文学翻译、散文、报告文学写作多年，还阅读和研究过不少中外名家的作品，具有较深的艺术修养和精致的艺术口味，所以他一起笔写小说，就有较高的艺术追求，很讲究创作艺术和表现技巧。他曾说过：“我常常觉得一切文艺的活动，无论创作或批评，都应该为人类添加些什么，或是智慧的果实，或是新鲜的花朵。”^⑫他前期创作的这六篇小说，就是这种艺术探求的最初成果；它们的艺术色泽和芳香，至今对人们还有一定的吸引力。

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切的艺术格调，是周立波前期小说最惹人注目的艺术特色；这一特色作家在以后的创作中一直注意加以保持和发扬，成为他创作艺术中很有生命力的东西。作家的前期小说，都有鲜明的政治内容，但它们几乎又都是通过日常具体的生活情景透露出来，很容易被读者吸收和接受。这种艺术功效从何而来？主要是作家善于巧妙地将时代风云和社会矛盾生活化，也就是他能把自己在分析、提炼生活时所获得的对于社会矛盾和时代精神的把握，溶解和还原于生活，通过构想逼真的生活画面，借助人物的日常言行举止再现出来，达到政治内容与生活气息相融合。《第一夜》等五个短篇对狱中尖锐的矛盾斗争的反映，虽然也通过了一些直接正面冲突的场面来体现，但主要还

是借助囚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景，诸如投进监狱第一夜的见闻感受、麻雀飞进牢房引起的有趣争论、对生病难友的同志式关怀、寂静夏夜的感触和思绪、战友殉难时的悼念和决心等烘托和透示出来。《夏天的晚上》展现了狱中一个普通夏夜的情景。在这月明风凉的迷人夏夜，囚禁在监狱的革命者思绪缕缕。他们本是年轻人，他们很自然想着这时若在外面该有多少的“嬉游和欢快”，但此刻在这牢房里，就连一点解渴的凉水也难于得到。想到这些，乡愁家恋油然从心中升起，他们不自觉地依照个人的身世编织自己的愁思，昔日牢房中的昂扬之气顿时低落。突然几个较成熟的同志警觉起来，努力排遣自己的愁思，并去宽慰、激励战友，要大家“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于低落的情绪，我们一定要坚决的扫除”。于是低落情绪为之一扫，人们又以昂扬的斗志去迎接明天的斗争。这是多么真切的生活情景，又是多么有思想含蕴的笔墨。在这里，习常的生活举止，合乎情理的心理活动，自然真切的思想交流，织成了一幅逼真的狱中日常生活图画，而社会矛盾和时代精神就融贯其中。写狱中生活这样运笔，确实具有独特性。这种特色的出现，与作家注意吸取欧洲进步现实主义文学注重通过日常生活、社会风俗体现社会和时代面貌的艺术经验和方法分不开。由于对社会矛盾和时代精神主要不着眼直接呈现和诉说，而讲究用日常生活来烘托、透示，使他的作品表现出一种朴素而蕴藉、平易而隽永的艺术风味。

在人物塑造上，周立波前期小说也有鲜明的特色，这主要是他习惯于抓住人物性格中某一最突出的特征，采用行动、心理描写相交融的手法进行精细的刻划，艺术上追求单纯美和抒情性。所以他笔下的一些人物，往往性格侧面不多，但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有含蕴，能给人鲜明的印象和特有的韵味。小柳是五个短篇中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也是一个刻划得成功的形象。他是一

个只有二十一岁的青年工人，又是一个从事革命多年、先后坐过三次牢的“老”共产党员。作为一个青工，他自然热情、机敏、乐观开朗，但他又经过了较多的锻炼，也就同时又具有深沉、多思和目光较远大的特点。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作家不去平面并列地刻划他性格的各个侧面，而只是抓住他性格中最突出最有光彩的东西——处处革命第一、他人第一，时时准备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品格和精神进行集中刻划；在展示这一主要性格特征在不同情况下的种种具体体现中，又自然显现人物性格的其他特点。《麻雀》主要刻划小柳革命第一、他人第一的精神。麻雀被狱卒发现，他一个人去受罚，就表现出这种可贵的精神。当战友们担心他身体吃不消，要替他受罚时，他轻松地说自己这几天本来就口味不好，“也实在吃不下饭”，受饿几天没关系，叫大家放心。这样，他革命第一、他人第一的品质就和年轻人乐观开朗的脾性交融在一起，既有生活情趣，又有个性色彩。小柳与二十七号狱卒关于“家庭和自杀”的对话更是妙趣横生，它通过对狱卒进行戏弄的喜剧性场面，刻划了小柳坚强的生活信念和炽热的革命理想，揭示出他献身精神的思想基础。《夏天的晚上》打开了他内心世界的另一面窗户。小柳处处站在斗争的前列，时时准备为革命献身，难道他就没有一点牵挂吗？不，在那迷人的夏夜，他也和同志们一样内心涌出乡思家恋。他有多难的家庭，有与自己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妻子……，只不过他知道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这一段抒情性描写，不仅揭示他性格中理的内涵，还赋予它情的色彩和旋律。通过这些艺术描写，使小柳这个形象的主要性格特征很突出，有韵味，艺术上有一种单纯美和抒情性。这种特色在小陈、阿金、张启南等人物身上，也依稀可见。

文笔清新流畅亲切，富于幽默感，也是周立波前期小说透露出的另一个艺术特色。他写每一篇小说，都不是装腔作势造文，只不过是把自己熟悉并认为有意义的生活和故事

亲切地讲给人家听。有感而发，同读者恳谈，这种诚实的写作态度和艺术作风，必然给他的作品带来清新、流畅、亲切、质朴的文风。他结构作品，不搞人为的复杂和曲折，不故作惊人的笔，他总是让生活之水顺着它的自然流向向前淌，但又不是没有艺术用心，只是平铺直叙说故事。《第一夜》是按时序为线索进行结构的，小说就是对“我”入狱第一夜见闻感受的记叙，结构可谓平实、无奇。然而作者通过铁门上锁声、深夜钟声、狱外传来的庆除夕的爆竹声，勾起“我”的阵阵思绪，于是又展开了主人公对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向往，对外界的怀念和对狱中生活的估量，引导出了生活的波澜，平实的文路又显变化。这就是说，他结构作品以表现人物为依据，顺乎生活的逻辑。他后来这样说过：“悬念或伏笔，衬托和波澜，以及高潮等等这些文学的章法，我都略懂而且有时也使用，但根据人物的发展和事件的起落，这些技巧能用则用，不能用时，没有勉强。”^⑬其实，这种创作思想在他前期创作中就开始产生。作家的语言朴实、清新、自然、有幽默感。他写人写事从不多加雕饰，不用过火的语言，没有几多形容词和装饰语，总是用清淡素雅、凝炼自然的语言从容写来，准确表现事物的特征和风貌。遇到需要讽刺敌人，或规劝同志，或对生活表露自己确信的见解时，笔调往往散发幽默、诙谐的气息。如《麻雀》写小柳与二十七号狱卒那番关于“家庭和自杀”的对话，就充满了幽默感，反映了革命者的生活信心和乐观情绪。读周立波的作品，人们并不感到他在向你灌输什么，更没有些微强加于人的意味。他总是以恳切的语调，绘声绘色地对人诉说和恳谈，让你同他一起领受革命生活的熏陶和教化。周立波在运用艺术技巧上这种自然、不勉强、不做作的特点，与他追求真实描写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紧密相联。

四

从周立波当时一系列的理論主張和作品

的主要思想艺术特色看，作家在自己文学活动的前期，对革命现实主义作了积极的追求和探索，理论评论和创作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应指出，他的作品在反映现实矛盾和表现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上还缺乏深度，现实主义精神不够充分、坚实，这个不足在《牛》这篇直接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中表现得较突出。《牛》有一个良好的创作意图：表现抗日根据地农村的新生活和农民精神面貌的变化，但是这个创作意图没有得到很好的艺术体现。作者选择母牛下崽之事作触媒，展现张启南由懒变勤的变化，然而母牛下崽有什么社会意义，它与张启南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的变化有什么内在联系，却没有揭示出来，因而主人公的思想转变根据不足，脉络不清，生活的本质特征和根本性变化也就未能显现出来。作品的这个缺陷，从表面上看，好象主要是由于题材选择不当，母牛下崽之不足承担体现农民精神面貌变化的任务，而实质上则是作者对农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不熟不懂，缺乏深切的体验和理解，未能把握生活的本质和农民精神面貌根本性变化之所在所致。对劳动人民生活的不熟悉和对时代本质缺乏准确的把握，还导致他艺术表现上的另一缺陷：有时拘泥于局部的生活真实，满足于对生活表面现象的琐细描写。《牛》就以主要篇幅细写母牛从发动到分娩的全部过程和张启南对母牛小牛怜爱的心理，显得缺少思想含蕴，流露出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某些痕迹。当然，革命现实主义并不排斥写日常生活小事，但它必须与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赋予它一定的社会意义。也就是说，必须把生活现象的真实与事物本质的真实联系起来，前者要反映后者、揭示后者。对于自己前期小说创作上的这些缺点和问题，周立波以后多次作过检查和认识。一位记者曾这样转述过作家的认识：“他认为，最初他在上海从事文艺创作时，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是‘心中无数’的，周围所接触的人也多是知识分子，所以他写狱中生活的一些

作品,生活都是不够饱满的,写工人或农民都不象。”^⑭他自己也写过文章进行回顾和反思,说自己刚来延安时虽然也下过乡,但深入生活不够,与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有较大距离,所以把握不住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风貌的本质,那么要写工农,也就“只有写写牛生小牛的事情,对于动人的生产运动,运盐和纳公粮的大事,我都不能写。”^⑮很明显,周立波在文学活动的前期,在理论上是接受了革命现实主义原则,并在创作上作过一些探索和实践,但总的来说,当时他实行这一创作原则的生活基础和思想条件还不怎么具备。他对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工农兵群众不熟悉,在思想感情上与他们有较大距离,这就使他实践革命现实主义的主观愿望常常不能在创作上得到较好的实现。这种理论和实践、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上的矛盾,反映了作家对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解欠深,实践也是处于摸索阶段。因此我们只能说,周立波的前期文学活动是他一生整个革命现实主义征程中的摸索阶段、起步阶段;它与以《暴风骤雨》作标志的坚实地走上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阶段、以《山乡巨变》为标志的创作成熟期,构成了作家整个文学活动和创作发展中的三个大段落。

尽管周立波前期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还不够充分和坚实,对革命现实主义的实践还处于摸索阶段,然而它在作家整个创作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首先,这个摸索、起步的实践阶段,为他一生的创作活动开了一个好头。根据我们前面对周立波前期小说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这些作品的生活内容不够厚实,反映现实还缺乏深度,但决不能说它们的创作方向不正确和思想倾向有问题。他一开始创作就能冲破“自我”狭窄的小天地,把眼光投向社会,努力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使自己的创作活动与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作家以后的创作活动一直继续和发扬了这种精神,只是在不断深入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同他们

实行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去掉认识生活肤浅、表现劳动人民还不够深刻的缺点,向着成熟和坚实的境地发展,而没有从一个阶级的代言人到另一个阶级的代言人这样的方向、道路性的大转折。周立波能把自己一生的创作精力和才华无保留地献给时代和人民,是与他在文学活动的前期所打下的思想基础分不开的。其次,这个摸索、起步的实践阶段,也最早显示出作家个人的艺术气质和创作特色,诸如讲究寓社会矛盾和时代精神于逼真的日常生活画面中,追求对生活精细的写实,注重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和抒情性描写,以及语言文笔的朴素清新、自然隽永而富幽默感等。他在以后的创作中始终保存了这些艺术特色,只是在不断的艺术探求中加以丰富深化。我们可以说,在周立波独具特色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中,他前期小说的基本艺术特色,是其基本的、稳定的构成因素。

注释:

①⑮ 参见周立波的《后悔与前瞻》(1943年4月)、《谈思想感情的变化》(1952年6月)、《周立波选集·序言》(1958年11月)。

② 周立波《理论检讨》,上海《大美晚报·文化街》(中文版)1935年6月17日。

③④ 周立波《文艺的特征》,《读书生活》二卷二期(1935年)。

⑤ 周立波《我们应该写什么》,《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一期(1936年)。

⑥⑨ 周立波:《我们现在的文学》,《读书生活》第三卷第七期(1935年)。

⑦ 周立波《观察》,《读书生活》第二卷第八期(1935年)。

⑧ 周立波《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大晚报》1934年12月31日。

⑩ 参见《斗争生活的生动写照》一文,《收获》1980年第四期。

⑪ 沙汀《安息吧,立波同志》,《文艺报》1979年第十一、十二期。

⑫ 周立波《谈阿Q》,载《文学浅论》一书中。

⑬ 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

⑭ 《周立波访问记》,《文汇报》1952年7月17日。